

【区域协调发展】

# 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关键症结与着力方向\*

赵彪

**摘要:**东北全面振兴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大局。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新动能和新优势不断涌现。然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持续提升,东北振兴面临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包括“一城独大”,缺失城镇化的有效集聚中心;“一业独大”,缺失工业化的实效组织载体;“一企独大”,缺失城乡一体化的高效桥梁纽带等,造成东北地区“集聚能力弱”和“发展成本高”两大困境,中心城市集聚能力不足是主要原因,中心城市行政区划设置滞后是关键症结。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应以优势地区为载体打造新的增长极,深入推进中心城市行政区划改革,实现从区域边缘末梢到开放枢纽的转变。

**关键词:**东北全面振兴;中心城市;行政区划;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5)01-0055-07 收稿日期:2024-10-11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资助重点学科“中国边疆安全学”(DF2023ZD06);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项目“新疆兵团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2024QQJH093)。

作者简介:赵彪,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101)。

## 一、引言

东北地区地处东北亚中心区域,是中国重要的工农业基地和向北开放的前沿门户,具有滨海、边疆、枢纽、末梢等多重属性,东北地区振兴发展关乎国家发展大局。然而,受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东北地区发展面临从“东北现象”到“新东北现象”(田毅鹏等,2019)的一再衰退、屡振不兴的客观事实(赵儒煜等,2017;冯彦明,202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东北振兴,指出东北地区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东北振兴到了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节点,新时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和全方位振兴。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政府和市场、自主和开

放、发展和安全等一系列关系,做到相互促进、齐头并进,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能单打独斗、顾此失彼,不能偏执一方、畸轻畸重,要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在实际行动中形成一盘棋。加强对东北全面振兴关键症结与着力方向的研究,有助于精准发力与科学施策,增强东北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加快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日趋严峻复杂,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作为当今世界政治最为敏感、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东北亚是大国力量交汇与利益角逐之地。东北地区是中国面向东北亚、推进亚太合作的核心战略承载区,需要重新认识和全面理解东北地区的战略价值与比较优势,在更大的时空格局中审视、定位东北地区。从“北大仓”“共和国长子”到“老工业基地”,从“东北振兴”到“东北全面振兴”,新时代东北地区的特殊作用和战略价值正日益突显。一方面,

东北全面振兴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更稳定更牢固。另一方面,东北全面振兴对于不平衡发展问题、双循环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破解都具有重要意义,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以不平衡发展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长期扮演向全国“输血”的角色,尤其是三线建设时期,东北地区“竭尽全力、不计成本”的援建,向三线地区内迁企事业单位200多个、人员近100万、援建项目300个(周明长,2018),导致东北地区面临巨大的发展压力。改革开放初期,东北地区每年平价向关内调拨粮食、木材、煤炭、石油等上千种物资,由于东北地区是第一个进入和最后一个退出计划经济的地区(柳卸林等,2004),在实行价格“双轨制”时期,东北地区更是长期处于“失血”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持续下降,从1981年占比15.67%降至2022年的4.81%,东北地区日益成为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短板”,南北不平衡发展问题进一步加剧。

通过上述分析,东北地区发展困境与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密切相关,周期性问题、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错综复杂,资源型城市转型、服务型政府转型、国有企业转型纷繁交织,亟待理顺央地关系、政企关系和城乡关系,东北地区已成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东北地区作为边疆地区,面临着边疆省区发展的共性问题,“治国须治边,治边亦治国”,边疆治理同时涉及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多方面问题。作为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又面临着“一城独大”“一业独大”“一企独大”等个性问题。国内南北不平衡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国际东北亚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在某种意义上,东北地区就是中国发展的“棋眼”,“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东北全面振兴不仅是为东北地区发展探索新出路,也是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寻找突破口。因此,本研究聚焦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重点探讨其问题症结与着力方向,以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

## 二、东北全面振兴面临的突出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高质

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由此可知,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当前,东北振兴发展仍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1.“一城独大”,缺失城镇化的有效集聚中心,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城镇化是东北全面振兴的最大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东北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7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87%。然而,东北地区的高城镇化率与人口流失密切相关,2010—2020年<sup>①</sup>,东北地区总人口减少1099.8万人,城镇人口仅增加354.3万人,东北地区明显存在城镇化率“虚高”的现象<sup>②</sup>,城镇发展动能相对不足。据测算,2020年东北地区约2/3的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城镇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2010—2020年,除长春、沈阳、大连三市外,其他城市均为人口净流出地区,黑龙江、吉林两省80%以上城市的城镇常住人口都在流失,这表明东北地区城镇化对人口的吸引力和集聚能力严重不足。在城镇集聚能力普遍偏低的背景下,东北地区人口向沈阳等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更加明显,“一城独大”问题日益突出,2010—2020年,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四市的常住人口占东北地区人口总量的比重由30.23%增至36.13%,城镇人口总量占比由34.81%增至40.25%。以长春为例,2010—2020年,长春人口占吉林总人口的比重由27.96%增至37.66%,省会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3以上。“一城独大”使东北地区发展越来越依赖四大中心城市,然而,受自然环境、发展阶段、体制机制等因素的制约,东北地区中心城市普遍存在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综合承载能力弱、产业布局和城市功能空间配置效率低等问题,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日渐减弱。以大连为例,作为东北地区第一经济强市,大连肩负着引领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重大使命。然而,近年来大连经济发展速度连年放缓,2012—2022年,大连地区生产总值从7002.8亿元增至8430.9亿元,“大连之困”造成东北地区发展动能减弱、南北发展失衡加剧等诸多问题。根据梯度转移理论,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先从沿海地区的一线城市向边疆地区的省会等中心城市转

移,再通过边疆中心城市向区域性中心城市,进而向中小城镇转移。由于当前东北地区中心城市发展面临诸多困难,造成东北地区城镇化缺失有效的集聚中心,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加剧。

2.“一业独大”,缺失工业化的实效组织载体,加剧产业发展不平衡问题

东北地区产业发展“偏重、偏投资、偏国有”的特征十分明显,存在产业结构单一化、发展模式单一化和所有制结构单一化等问题,导致东北地区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等各类平台载体发展相对薄弱,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和高效化。其中,(1)产业结构单一化是指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对重工业、资源型工业的依赖程度较高,轻工业、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2022年<sup>③</sup>,东北地区三次产业结构为13.63:36.30:50.08,第一产业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33%,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0%和2.72%,产业结构日益失衡。就第二产业而言,一方面,东北地区第二产业比重持续下降,比2012年降低12.30%;另一方面,重工业和资源型工业仍占主导地位,以辽宁为例<sup>④⑤</sup>,2022年装备制造、冶金、石化三大支柱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占全省总额的51.14%,仅“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单一行业占比就高达18.91%,产业发展高度依赖单一行业。就第三产业而言,除“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和“其他”两个行业外,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明显滞后。(2)发展模式单一化指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长期依赖投资拉动,出口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相对较弱。新中国成立以来<sup>⑥</sup>,以1984年为节点,东北地区投资率(指总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1952年东北地区投资率为30.36%,逐步降至1962年最低的3.25%,然后开始波动上升,到1984年升至31.54%,超过1952年的投资率,并开始逐年上升,2013年增至65.13%,明显高于全国47.79%的平均水平。但是东北地区投资效率明显偏低,以吉林为例,1978—2022年<sup>⑦</sup>,吉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2.20%增至101.41%,这表明投资对吉林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已大幅下降。(3)所有制结构单一化指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依赖程度较高,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类型的企

业发展相对滞后。2022年东北三省<sup>⑧</sup>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3.18%,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88%,与此同时,东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占比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7.35%。

3.“一企独大”,缺失城乡一体化的高效桥梁纽带,加剧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

除“一城独大”“一业独大”外,东北地区还面临“一企独大”问题,即城市发展对单一国有企业高度依赖,而国有企业往往有一定级别,其主要负责人由所属的各级政府监管部门任免,受属地政府的影响相对较小,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城市管理权力弱化、政企关系协调难度增大、分割城市内部各主体之间的横向联系等问题。计划经济时期,城市长期被看作工业项目的附属设施,“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发展”的特征明显,工业布局随意性较强,自成体系,甚至出现“一厂一水”“一厂一线”的现象(赵彪,2019),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持续提升,这类城市在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一企独大”格局难以有效带动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导致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产业关联度不强、生产衔接程度不高、配套融合性较弱,抬高了城市化的门槛,进而影响城市发展的质量和效率。东北地区普遍存在“一企独大”的问题(包括长春和许多资源型城市),导致城市内引外联能力弱,经济腹地狭小,辐射带动能力有限,城市发展存在较为明显的“孤岛”特征。

### 三、东北全面振兴受制约的关键症结

东北全面振兴是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要战略,将深刻影响中国乃至东北亚的安全和发展格局,但受制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东北地区仍存在“大而不强”“结构不优”等问题,这与东北地区要素集聚能力不强、生存发展成本较高密切相关。要素集聚能力不强导致收入少,生存发展成本较高导致支出多,“收少支多”使东北地区经济长期处于“失血”状态,这是制约东北地区振兴发展的核心问题。进一步分析可知,行政区划设置滞后是导致东北地区中心城市集聚能力不足的关键症结。

#### 1. 中心城市集聚能力不足是核心问题

中心城市要素集聚能力不强使东北地区难以

产生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生存发展成本较高使东北地区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负担更重,“驱动力较小”与“摩擦力较大”共同作用,加大了东北地区的发展难度。由于地处边疆的特殊性,东北地区在自然环境、空间区位,不利于吸引人口、资本和产业的集聚,不得不长期依赖投资拉动型的发展模式,而受制于资源规模和市场容量的有限性,东北地区投资拉动型发展模式的边际效应递减趋势也日渐突出。原材料、人口、企业、土地分别具有资源与劳动力供给、降低交易费用、提供政策环境等作用,在要素流动、知识积累、产业分工和城市发展的交互作用下,加速了规模效应、耦合效应、乘数效应与溢出效应的产生,进而促进成本变动、

人口迁移、产业升级和地域分工,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持续提升(见图1)。然而,由于东北地区原材料运输成本、人口就业和通勤成本、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等都相对偏高,直接影响要素流动、知识积累和产业分工,加速了规模效应向拥挤效应、耦合效应向挤出效应、乘数效应向锁定效应、正溢出效应向负外部效应的转化,抑制了产业分散发展阶段向产业关联发展阶段的演进,不利于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中心城市集聚能力不足且发展成本较高,导致东北地区增长极和动力源逐渐弱化,是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困境的关键所在。

由于沈阳、长春等副省级中心城市能级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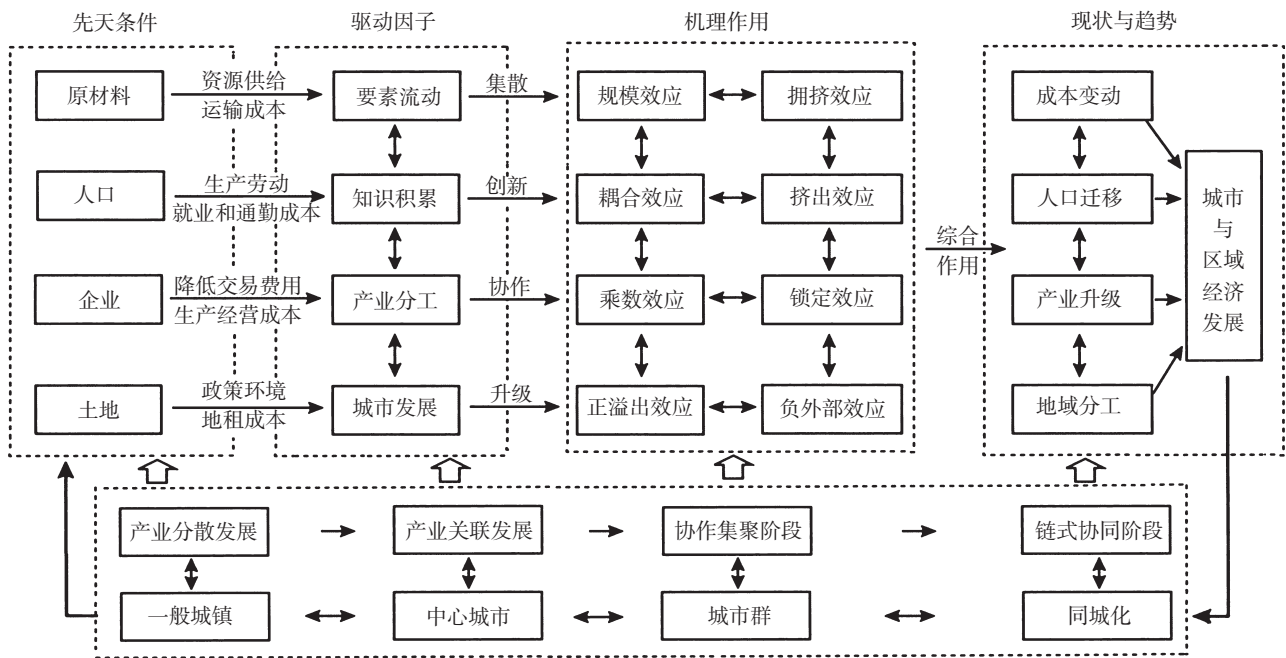


图1 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东北地区参与国内大循环的能力弱化,难以有效承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进而无法推动自身产业升级以及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由于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质量不高,难以有效承接省会等中心城市的产业溢出,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产业关联度较低,造成中心城市发展缺乏网络状城镇体系的支撑,“中心”与“周边”相互分割的特征相对突出,造成城镇体系存在“大的太大、小的太小、缺乏中间环节”的结构性问题;边境中心城市发展滞后,导致东北地区参与国际大循环的能力有限,多属于依赖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内向型经济体系,加剧了人

口流失等问题的产生,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数据,2012—2022年东北地区33个边境县中,2/3以上的县级行政区出现人口外流现象。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心城市是东北振兴发展的关键抓手,东北地区应高度重视对边疆地区“制度性资源”的供给,增强自身“造血”能力。

## 2. 中心城市行政区划设置滞后是关键症结

中东部地区投资拉动型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不适应东北等边疆地区。行政区划作为国家与城市治理的空间基础,是政权建设与管理、资源整合与分配的重要手段,行政区划设置滞后是造成

东北地区集聚能力不强与发展成本过高的关键症结。行政区划设置加剧了东北地区集聚能力弱、发展成本高、大中小城市不协调、中心与外围相互分割等问题,导致政策落地难、投资边际效益递减、人口外流以及空间极化等问题,进而弱化了政策、经济、社会、空间等驱动因素,以营商环境、产业结构、体制机制、人口外流等问题为表象,深刻影响东北地区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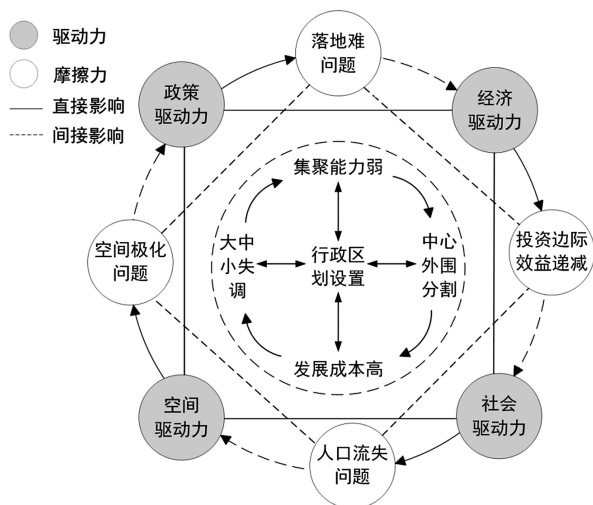


图2 行政区划设置对东北振兴发展的影响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首先,规模不适度指行政区划规模不合理导致的问题,如市辖区规模过大、所辖行政区数量过多等。市辖区规模过大容易产生大量距中心城区较远的市辖区(下称郊区型市辖区),在现行市区体制关系的背景下,市本级往往将市辖区的财政收入、土地指标等统一集中支配,为获取更高的收益,往往将多数用在中心城区,从而产生公共服务资源的集中化配置与人口真实分布状态之间的矛盾,无法对郊区型市辖区产生正面溢出效应,削弱地方的自主发展权,不利于进一步发展。这类问题在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的地区尤为明显,设区市容易出现过于关注中心城区、忽视距离较远的郊区、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郊区型市辖区容易出现过于重视城市建设和招商引资、忽视“三农”发展的重要性、加剧乡村衰败的问题(赵彪,2019)。如伊春在行政区划调整之前,以120多万人的规模设置了15个市辖区,产生资源配置不足与浪费现象并存、财政困难以及民生工程欠账较多等问题。

其次,结构不合理指行政区划结构和形态差异产生的问题,如中心城区紧邻省市行政边界、行政

中心设置不合理、郊区包围城区等问题。以大连为例,大连是三面环海的半岛型城市,人口和产业主要集中在大连湾周边,发展空间相对有限,随着城市规模的持续扩大,与平原地区城市相比,大连更容易产生规模不经济问题。当前,大连明显存在“中心城区开发强度过大,周边县市集聚能力不足,功能区缺乏要素保障”的问题。一是中心城区开发强度过大,生产生活成本快速上升。大连经济增长长期放缓与中心城区开发日趋饱和密切相关,常住人口快速增加与建成区面积的相对稳定形成鲜明对比,造成大连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较大、房价偏高等诸多问题,进而抬高了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2012年,大连市辖区建成区面积为428.00平方公里(含后改区的普兰店),2022年增至444.04平方公里,近十年仅增加16平方公里,年均增加1.6平方公里,由此可见,大连市开发强度早已接近饱和状态,而同期大连常住人口却增加了75万人以上,西岗、沙河口等中心城区人口密度都大于1万人每平方公里,人地矛盾日益突出。二是周边县市要素集聚能力不足,难以产生规模效应。中心城区人口压力过大,但周边区县人口集聚能力却相对不足。除中心城区外,旅顺口区、金州区的城镇化率都在80%以上,而北部四县(市、区)城镇化率不足55%,仍有110万以上的乡村人口,城镇化发展潜力较大。三是功能区产业协调发展难度大,加剧职住分离问题。为缓解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大连设立了金普新区、普湾经济区、北黄海经济开发区等多个功能区。然而,由于这些功能区多数仅具备经济管理权限,容易出现配套设施薄弱、招商难和融资难等现象,进而造成产业链相对较短、同质化竞争等问题,三次产业协调发展难度较大,不利于人口集聚和产业升级。又由于各类功能区的职能较为单一,难以引人留人,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人口在中心城区和功能区之间周期性流动的特征,加剧了大连职住分离的问题。

最后,体制不完善指行政区划建制设置不合理导致的问题,如行政层级偏高或偏低、行政建制缺失或过多等。以绥芬河为例,在清末中东铁路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地形原因,将铁路东端从东宁移至绥芬河,开启了绥芬河“百年口岸”的历史。绥芬河曾长期隶属东宁,随着口岸经济的发展,绥芬河逐渐脱离东宁,经历了绥芬河市(1926年)、绥芬河区

(1968年)、省辖计划单列市(1975年)、市管县级市(2017年)等多种体制。当前,受行政体制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绥芬河发展面临着以下困境。一是行政层级较低,统筹协调难度较大。绥芬河是县级市,作为口岸城市,具有的功能之广和承担的使命之大与行政规格之低形成明显落差,对外交往不对称,对内协调繁琐。在信贷、规划、土地和外事等诸多方面受制于上级主管部门,自身发展潜力难以充分释放。绥芬河三面被东宁包围,两市内部沟通协调成本较高,不同程度上存在同质化竞争等问题,难以做大做强成为中心城市。二是地域范围狭小,发展空间难以拓展。由于主要水源地和民用机场都在东宁境内,绥芬河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承受较高的发展成本,又由于发展空间相对狭小,制约制造业规模的扩大和产业链的延长。2023年,三次产业结构为2.6:11.9:85.5,第二产业比重偏小,第三产业发展层次不高,产业链明显较短,难以在绥芬河—东宁区域培育出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

#### 四、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着力方向与发展要点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心城市发展动能减弱对东北振兴发展造成了明显的不利影响,而行政区划设置滞后是制约东北地区中心城市发展动能释放的“制度天花板”,由于东北地区地处边疆地区,面临集聚能力弱和发展成本高两大困境,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模式在东北地区存在一定程度“经验失灵”问题,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迫使东北振兴依赖越来越大规模的“投资驱动”,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大局。基于此,本研究认为东北全面振兴应着力解决中心城市行政区划设置的主要矛盾,为激活新引擎、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高效的制度支撑。

1. 聚焦关键节点,以优势地区为载体打造新的增长极

边疆中心城市是对外开放的前沿,是边疆走向世界的通道,是世界了解边疆的窗口,推动边疆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是破解当前边疆与内地不平衡发展困境的关键举措之一。东北地区的边疆中心城市应发展为陆疆国际交通运输枢纽中心和国际贸易流通中心,以经济功能为基本和主要的城市功能,逐步将边境贸易转变为大规模、规范化、集约化

的边境国际转口贸易,结合工业的发展,发展外向型的边境加工贸易,加快从边境贸易流通中心向陆疆生产和服务中心转化。推动边疆中心城市发展,有助于增强综合承载和资源配置能力,推动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的产生,是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重要着力点,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动力源,要从资金、项目、政策、制度等多方面,加大对边疆中心城市的支持力度,持续将边疆中心城市打造成强边富边兴边的“稳定之锚”。

2. 补齐短板弱项,深入推进中心城市的行政区划改革

首先,坚定不移实施“强省会”行动,激活东北地区边疆经济增长极,重点解决哈尔滨、沈阳等副省级城市市辖区规模不适度、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针对具体城市进行深入研究,因地制宜制定兼具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行政区划改革方案。其次,积极培育次中心城市,缓解中等城市发展能级不足的问题,着重激活“地级市”这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切实有效缓解东北地区“中等城市”数量偏少、能级不足的问题,形成规模扩容与空间收缩相结合、规模调整与结构转化相结合、区划调整与体制改革相结合的分类指导机制。最后,深入推进行政区划体制改革,适时开展县级行政区规模结构调整,从“体制”和“空间”两方面着手,理顺“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功能区与所在县(市)的关系,重点研究人口大量流失的人口小县、农业大县的出路问题,探索包括“中心城市升格兼并周边县”“特大镇设市”以及“小县降格为大镇”等多种改革方式。

3. 释放区位优势,实现从边缘末梢到开放枢纽的转变

边疆与内地联动发展机制的形成,对于调整优化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东北边疆省区广阔市场将形成强大的内需动力,从而拉动整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东北边疆省区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加深也将大大拓展我国经济的发展空间和容量。边疆发展外部拉动力不足、内部驱动力不强的问题十分突出,要在重新审视边疆发展地位与意义的基础上,彻底改变忽视边疆经济发展重要性的传统思维。新阶段下,中国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为边疆的产业升级创造了良好条件,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会重塑包括边疆地区在内

的中国经济地理。边疆省区各级政府应该秉持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结合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双循环大局建设,有效释放边疆中心城市的发展潜能,坚定不移地深化市场改革和消除合作的关键瓶颈,加快打通东北陆海新通道、中蒙俄跨境运输通道、东北亚多式联运通道等国际贸易大通道,进一步提升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

###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201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2020)》《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1)》《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1)》。②由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由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得出,当城镇常住人口不变、总人口减少时,也会导致城镇化率的提高。③数据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3)》《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23)》。④数据来源:《辽宁统计年鉴(2023)》。⑤具体行业划分依据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s://www.stats.gov.cn/zsk/snapshot?reference=33e2b9cdb6391521c53328be6244e40b\\_B98992577597C0E91742A264E0CE6E08&siteCode=tjzsk](https://www.stats.gov.cn/zsk/snapshot?reference=33e2b9cdb6391521c53328be6244e40b_B98992577597C0E91742A264E0CE6E08&siteCode=tjzsk)。⑥数据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4)》。⑦数据来源:历年《吉林统计年鉴》,其中2022年数据是依据2017年实际投资总额及2017—2022年投资增速估算得出。⑧数据来源:《辽宁统计年鉴(2023)》《吉林统计年鉴

(2023)》《黑龙江统计年鉴(2023)》,其中黑龙江为“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进一步验证了相关结论的可靠性。

### 参考文献

- [1]田毅鹏,康雯嘉.作为发展命题的“东北现象”:“东北现象”研究三十年[J].开放时代,2019(6).
- [2]赵儒煜,王媛玉.东北经济频发衰退的原因探析:从“产业缺位”到“体制固化”的嬗变[J].社会科学战线,2017(2).
- [3]冯彦明.东北振兴的中国经济学视角及其产业选择[J].区域经济评论,2022(2).
- [4]新华网.“东北一定能够重振雄风、再创佳绩”:习近平总书记赴黑龙江考察并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纪实[EB/OL].(2023-9-9)[2023-9-10].[http://www.xinhuanet.com/2023-09/10/c\\_1129854911.htm](http://www.xinhuanet.com/2023-09/10/c_1129854911.htm).
- [5]周明长.东北支援与三线城市发展[J].开放时代,2018(2).
- [6]柳卸林,刘建兵.为什么东北工业落后了:基于创新能力的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11).
- [7]大连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大连调查队.大连统计年鉴(201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 [8]大连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大连调查队.大连统计年鉴(201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3.
- [9]赵彪.改革以来我国市辖区体制变迁与空间扩展及政区优化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9.

## The Key Issues and Focus of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in the New Era

Zhao Biao

**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ortheast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with new drivers of growth and new advantages emerging.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a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t mainly includes the problems of “one city dominates”, the lack of effective gathering center of urbanization, “one industry dominates”, the lack of effective organizational carrier of industrialization, “one enterprise dominates” and the lack of efficient bridges and ti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ack of agglomeration capacity of central cities, and the lag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setting of central cities is the key crux, resulting in two dilemmas of “weak agglomeration capacity” and “high development cost” in Northeast China.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create new growth poles with advantageous areas as the carrier, deepen the reform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central cities, an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open hub.

**Key Words:** Northeast China's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Central City;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彦 伦)